

加尔各答的华侨华人：移民模式与职业特性

梁慧萍¹ 著，胡修雷² 译

(1. 印度自由学者，印度 阿萨姆；2.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7)

[关键词] 华侨华人；印度华人；印度；加尔各答；移民模式；职业特性

[摘要] 从十九世纪的早期移民、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难民、二战后到加尔各答的移民、职业特性等方面阐述了加尔各答华侨华人的移民模式、经济特性、努力奋斗成为当地居民的过程及其为当地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中图分类号] D634.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8)04-0024-09

The Kolkata Chinese: Migration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Specializations

Jennifer Liang¹, Translated by HU Xiulei²

(1. Independent Scholar, Assam, India; 2. Chinese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Beijing 100007,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Indians; India; Kolkata; migration patterns; occupational featur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outlines the three phases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to Kolkata. It suggests that the migration of the Chinese took place in three distinct phase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mostly skilled workers from China came to Kolkata seeking better employment;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hen social unrest and Japanese invasion brought Chinese refugees to the city; and the post-1945 period, when civil war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s triggered the flow of a third wav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economic speci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as they became residents of Kolkata, including carpentry, shoemaking, tannery, and hairdressing.

中国人向加尔各答迁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迁移到加尔各答的中国人以商人和技术工人为主，他们的愿望是谋取更好的工作和发展机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政治动荡引发大批中国难民来到加尔各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中国人迁移到加尔各答并在这个城市长期定居的第三个阶段。依据对加尔各答当地华侨华人的访谈及其个人经历和回

忆，本文勾画了华侨华人移民加尔各答的移民模式、经济特性、努力奋斗成为当地居民的过程及其为当地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一、十九世纪的早期移民

阿钊 (Atchew) 是一位商人，通常被认为是“到达印度定居的第一个中国人”。尽管他到达印度后不久就去世了，但是阿钊的到来预

[收稿日期] 2007-07-25; [修回日期] 2008-11-15

[作者简介] 梁慧萍 (Jennifer Liang), 女, 硕士, 印度华裔, 印度自由学者, 非政府组织 ANT (the Action Northeast Trust) 创办人。

示着中国人开始把印度看作出国谋求更好生活的一个新的目的地。陈同放 (Chen Tung Fong) 是一位消瘦的七十多岁的湖北籍退休牙医，他一辈子都居住在加尔各答老唐人街区的提拉蒂 (Tiretti) 市场工作。陈同放出生在印度，他的父母在 19 世纪移民到加尔各答。在谈到 18 到 19 世纪印度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时，他认为：“就像今天人们听说在加拿大和美国存在大量的发展机会一样，那时的中国人也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涌进了印度。比如我的父亲，肯定是听到了有关在印度的美好生活而出国的。那时，从小村庄走出来的人们似乎已经把印度想像成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地方，这种理念推动着我的父辈们来到这儿。”

陈同放继续补充道：“与现在不同，那时的印度被英国人统治着并被看作是一个富饶的国家，具有良好的管理和充足的工作机会。”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一个“机遇之地”。与 18 到 19 世纪政治上发生剧变的中国相比，印度是一个安全、稳定并且充满机会的地方。中国人被印度充满大量机会的情景所吸引，纷纷出国到印度去谋生。他们的想法是赚到钱后就返回中国。很多人确实是这么做的。大量从广东出来的木匠就反映了这种趋势。他们是具有技能并且很具灵活性的第一批移民。何伟源 (Ho Wei Yuan)，一位已经 90 多岁、最早一代出国的木匠激动地回忆着：“英国人统治的时代非常欢迎和喜欢中国人。与当地的工人不同，中国人很容易相处并且具有高超的技能。当工作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小翼翼，即使顾不上吃饭，我们也尽量按期完成任务。这就是我们不懂一句英语却能够依靠肢体语言同英国人在工作中交流的重要原因。”

与英国人的友善关系保证了印度华人社会从最初的艰苦岁月中延续下来。从一开始，华人似乎就把英国人而不是当地的印度人当作他们心目中崇拜的对象。正如何伟源喜欢说的那样：“那个年代非常好。英国人一点不像印度人。他们把国家管理得很好。现在你看看周围，非常肮脏，非常堕落……”这在加尔各答的华人社会中似乎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甚至跨越了年龄和阶层。在英国统治阶层和华人

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惠关系。英国人讨厌当地居民，认为华人更容易共事，在他们眼里，华人是一个工作勤奋和易于相处的群体。

何伟源举了一个华人勤奋工作的例子。他带着自豪感讲述了这件事情，一个英国人（通过许多言语和手势）要求一个中国木工做一个木制的关猴子的笼子。这个中国木工却给他雕刻出了一只木头猴子。尽管同英国人的交流不是那么容易，这种“尽力去做”和“愿意做任何事”的态度还是给英国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 18 和 19 世纪他们帮助印度加尔各答的华人顺利延续了下来。“因为认为我们很诚实，英国人雇用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工作”，何伟源接着说到，“那时，英国人甚至不介意中国人穿着鞋子走进他们的住所。他们很喜欢我们。不仅加尔各答的英国人要求我们到他们的茶庄去工作，甚至阿萨姆邦和大吉岭地区的茶庄也至少有一个中国木工在那儿工作。”

后来，许多来自加尔各答的华人迁移到了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其中包括很多来自中国的熟练木工，他们原来被英国人雇用在茶园里工作。这些华人在遇到自己的同胞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群体。之后，印度东北部的许多小城镇，包括大吉岭，开始出现华人社团、学校、俱乐部、墓地及其他社会组织。

梁润莲 (Leong Yuen Lin)，一位 60 多岁的广东籍妇女，已经居住在贾柏古里 (Jalpaiguri，靠近西里古利 Siliguri，位于西孟加拉邦的西北部) 多年。她的父亲因为在中国没有工作，所以来到印度投奔她的伯父。“当时，在中国的工作机会很少，即便有工作，赚到的钱也是入不敷出，”梁润莲在谈到她父亲来印度的原因时这样说。“在我父亲那个年代，谁能想办法养活一个家庭？”她认为，“到印度去就像今天很多人想到美国和加拿大去谋求发展一样。在印度谋生的各种好消息被返回家乡的人带到中国的许多乡村和城镇。那时，印度卢比比美元值钱得多并且印度卢比比中国流通的货币贵十倍。留守在中国的女子十分乐意嫁给在印度工作的任何男子。”当时中国的物价很便宜，一元多点中国货币就可以维持一个家庭一天的开销。她回忆道：“我的父亲在阿萨

姆邦工作期间积攒了 1500 元印度卢比。这足够他办一桩婚事并将妻子带回中国，在国内，这笔钱能够维持他和整个家庭三年的开销。当钱花完以后，日子又开始变得艰难，于是父亲又返回印度去工作了。”

商人和技工是第一批从中国迁移到英属印度的人。他们行囊空空，但却带来了自己的技能和为英国人工作的热情。在阿剌去世（1783 年）65 年后，一个名叫考里斯沃西·格兰特（Colesworthy Grant）的英国人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他这样描述了 25 个在屠宰街（Kasaitola，即今天的本提克街）工作的华人鞋匠：“产品风格独特并且价格适中。”他补充说，“所有在乡村地区工作的木工都是中国人”，他进一步观察到，“不管是技术还是灵巧性方面，中国的商人和技工都比其他东方人先进得多。”

林治如（Lim Tse Yee），一位出生在印度的 70 多岁的客家人，他的家族在加尔各答制鞋业当中是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我的祖父最早来到印度，他学会了制鞋交易但并没有在这儿定居下来，而是经常穿梭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尽管无法确定他的祖父第一次来到印度的确切时间，林治如认为很可能是在 19 世纪的后期。“他（指祖父）从没在这开过一家商铺，但却经常为别人工作，制鞋是那时他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在谈到为什么中国移民能够在制鞋领域中独自经营小生意的问题时，他认为，“在印度，制鞋和皮革制品是一种利润非常微薄的行业。印度人认为这是很大的耻辱所以不愿意涉足其中。但我们华人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在我们眼中这是一门能够轻松谋生的行业。”

18 - 19 世纪来到印度的中国技术工人和商人大多数都没有打算在这儿定居下来。他们更像是一群旅居者。正如林治如在解释他的祖父在印度充当一名制鞋匠所说的那样，“那时的工作环境非常糟糕。鞋匠每天蹲坐在地上工作的时间长达 14 到 15 个小时。他们通常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干到半夜。在经历了六个月的苦工生涯后，这些工人可以回到中国暂时放松一下。这些中国工匠通常轮流返乡。

当一个人回到中国，就会有其他人来代替他的位置。除了长期劳累之余的休息之外，他们必须返乡还因为他们的家庭在中国。大部分人在中国都有妻子和儿女。他们支付不起整个家庭居住在加尔各答的开销。回到曾经居住的村庄至少让他们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尽管很多中国工人经常穿梭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但仍有一些人决定在印度安定下来，他们居住在加尔各答的各个区域，久而久之在加尔各答就形成了一片唐人街。加尔各答的华人主要集中居住在下吉特普尔（Lower Chitpur）路、新娘市场（Bow Bazar）街和本提克（Bentinck）街附近的第 40、41 和 42 行政区。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华人居住在这个区域。根据汉森·阿里（Hasan Ali）的研究，华人集中居住的这片区域要么是自然形成的世界主义者的混居地，要么是靠近穆斯林和具有盎格鲁血统的印度人居住的地方。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于华人的饮食习惯和职业特性，这些职业是大部分印度人所不愿从事的。梁润莲认为：“尽管近年来变化很大，但是你在孟加拉人和古加拉特（Gujarati）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区很难看到华人的身影。通常来说，孟加拉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也不喜欢和华人居住在同一栋建筑物中。提拉蒂市场的马瓦尔素食者也因为我们吃肉而拒绝把房子出租给华人。”此外，制鞋生意要依靠从穆斯林那里获得皮革和未加工的原料，因此，加尔各答的非印度教徒和华人移民之间的关系要比华人和孟加拉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紧密得多。

二、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难民

第二波华人移民，同时也是今天加尔各答大多数华人的祖辈们，在 20 世纪初期来到了印度。20 世纪初期，满清帝国被民族主义者推翻。虽然经历了转变，但掌握实际权力的地方军阀们只关心扩充自己的地盘，对社会改革毫无兴趣。再加上国民党（即民国政府）官员

Hasan Ali, "The Chinese in Calcutta: A Study of a Racial Minority", in M. K. A. Siddiqui ed., *Aspect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alcutta*, 1982.

的腐败，地主们想方设法榨取贫苦农民的血汗钱。农民被迫以极高的利息借高利贷。农民的任何反抗都会遭到地主的私人卫队和他们控制的流氓的残酷镇压。甚至农民的妻儿也不能幸免，很多人由于还不起高额债务被抓去充当地主的家庭奴隶。如果农民付不起沉重的赋税及其利息，税收官有权将他们投进监狱，因此，不愿蹲监狱的人被迫借取每年高达七倍于本金的高利贷。地方军阀为维持私人军队所需的装备和补给也要由农民承担，他们几乎无力反抗。当贫穷的农民为了生存被迫加入地方军阀的军队后，抢劫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农业产量直线下降，农民的贫苦加剧了。

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掌握了政权并对民众实施高压恐怖统治。他的施政目的就是保持由少数享有特权的富裕家族及其利益相关者统治的、依靠军事独裁来维持的资本主义政权。孙中山是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一个凝聚力量，在他去世后不久，整个国家就陷入了内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争斗使整个国家陷入苦难之中。

吴汝桐 (Ng Yee Tung) 是1939年来到印度的广东木匠。他当时只有十多岁。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在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下，人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一旦被怀疑同共产主义者有一点联系，任何人都将遭到逮捕。成千上万的人失踪了，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那真是一个恐怖的年代，由于担心被误解、被告密而遭到逮捕，我们甚至不敢开口说话。”1931年日本人入侵中国占领东北以后，动荡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何生才 (Ho San Chai) 是另一位已经70多岁的广东老人，回想起童年时代和自己的伙伴在树下玩耍时，要时时提防巡逻的日本士兵。1938年日本人占领广州以后，他和父母亲逃难来到印度，当时他只有11岁。

第二波移民印度的中国人同18-19世纪来到印度的中国人一样，也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然而，这一阶段的移民和上一阶段相比有两点重大不同：包括妇女移民以及大量非熟练工人的涌入。事实上，很多20世纪早期的新移民是先前往返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华

人男性的妻子及其他家庭成员。现在，为躲避中国的战乱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儿来到印度，同时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返回到一个和平的中国。

在加尔各答，这些新移民见证了一个满足单身汉需求的社会：男性俱乐部、男性居住区和仅适合男性的工作等。加尔各答的华人似乎并没有准备好他们的家人在激战正酣时突然来到印度。最初的日子对于这些新移民来说并不容易度过，因为他们无法解决好自己的食宿问题。大量移民妇女、儿童和非熟练工人的迅速涌进，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中国不断恶化的形势促使他们坚信来到加尔各答是自己唯一的生存机会。

加尔各答华人的奋斗体现在阿梅 (Ah Mei) 的故事中，她是一个70多岁的四邑人。在她大概7岁的时候父母把她带到加尔各答。二战前她的父亲在缅甸工作，但当战争开始后他失去了工作。于是这个家庭离开缅甸决定到印度去碰碰运气。当到达加尔各答的时候他们没有亲属也没有认识的熟人。“很久以后，我们村庄里的人和我的很多亲属也来到了印度。但当我们刚到这儿时，一个人也不认识，”阿梅回忆着。她的父亲在他们到达印度后不久就去世了。“有人向他施了巫术，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到达这儿后，他失明了，继而精神失常，不久就去世了。”那时阿梅只有八岁，是四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女。

她的母亲不愿意返回中国去面对那儿艰苦的生活。“我们从艰苦的环境中逃脱出来，不想回去再次面临同样的困境。因此，我们决定呆在这儿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当时，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她的母亲帮人洗涤、熨烫衣服。“当时，唐人街有很多单身男人，还有很多士兵。我们通常为这两种人洗衣、烫衣。”后来，阿梅开始帮助母亲酿酒并卖给海员和士兵。尽管有这些工作，阿梅说她们赚的钱还不足以养活全家人。驻扎在华人茶馆附近的一支守卫部队经常给他们一些剩余的饭菜来救助他们。

那时加尔各答很多华人移民的经历都差不多：洗衣服、卖酒、做衣服、当木工学徒、每

天工作 18 个小时、在市场卖食品等。根据吴汝桐的回忆，“那儿有一些富裕的家庭，他们是在之前就积累下的财产，还有一些人是靠走私或者鸦片贸易而富起来的。”

情形很糟糕，因为很多新移民没有任何技术。他们之所以来到印度，要么是认识一些居住在加尔各答的他们原先村庄里的村民，要么是停滞在这个城市的无亲无故的难民。这些人缺乏技术，他们来到印度准备“做任何可能的事情”，或者依靠朋友和社会的救助生活。为了生存，他们开始学习贸易技巧，在华人木匠师傅和鞋匠手下做学徒。这是一场需时多年的奋斗。但是也有一些组织如“会馆”即地缘性社团发挥着那些将家庭留在中国的单身男人的家庭功能。印度华人相信他们能度过这些艰苦岁月，因为他们勤奋工作、诚实并对工作有责任感。

三、二战后到达加尔各答的移民

在整个二战期间，加尔各答的华人一直把印度当作他们临时的居住地。大部分华人都在等待战争结束以便能够返回中国。一些人希望回去完婚，有家庭的人则希望回去让他们的孩子能够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学习自己的语言以及进行“适合的中国式教育”。比如出生在印度、已经 70 多岁的客家人林治如，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当年就准备在战后返回中国。林治如说：“没有人愿意在印度定居。他们希望赚些钱后就返回中国，因为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中国教育。继续呆在印度，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我们都盼着早点结束战争，然后带着我们的家当返回中国。”

当 1945 年二战终于结束的时候，华人密切关注着国内不断恶化的形势。1946 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最后以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而告终。加尔各答华人并不了解国内的新政权，他们对回国有所顾虑。所有这些使加尔各答华人回国的愿望破灭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华人开始真正在加尔各答定居。

一些在中国有家室的华人想法设法把他们的家庭成员带到印度。一些不能把家庭成员带出国的人则娶了当地的尼泊尔或阿萨姆妇女为

妻。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蒙古人的特征，与华人比较接近。“最重要的是”，正如杨莲所说的那样，“她们至少看起来像我们中国人，否则的话，我们的孩子会没有中国人的特征。”已婚男人又结婚了，因此，中国男人有两个妻子和两个家庭是很平常的事，一个在国内的村庄，一个在印度。

那些原先期待战争结束返回中国完婚的单身汉，现在也开始结婚并准备在印度定居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加尔各答的华人社会以男性为主，要找到合适的华人女孩是很困难的事情。于是，很多人娶了“来自山里的”部落女孩或者印度东北部如大吉岭、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等地的女孩。还有些人娶了混血女孩，比如华人父亲和印度母亲的后代。这种现象在广东木匠身上尤其明显，他们一般都娶非华人血统的女孩为妻。另一方面，客家人则以自己“纯正的血统”而感到自豪，他们瞧不起那些娶“外来人”为妻的人。事实上，客家人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从中国找到理想的新娘。即使到了今天，也有很多客家人返回中国他们祖先居住的村庄去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

这样，男性华人开始在印度成家并定居下来。加尔各答的单一男性华人社会开始发生了明显变化。同时，以方言、宗亲和政治倾向为基础的各种社团进一步细化。与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一样，到达印度的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南部省份广东。这些所谓的广东人包括南顺、四邑、嘉应和东安地区的人。客家人大部分来自于广东省的梅县。还有一些华人移民来自于湖北、湖南和山东，也有来自上海的。然而，加尔各答地区华人移民的两个主要群体是广东人和客家人。加尔各答华人的职业模式和他们的来源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广东人主要做木匠，客家人从事制鞋业，湖北人主要从事牙医和纸花制作，上海人开洗衣店，山东人从事丝绸贸易。形成这种职业特征的原因可能在于，在到达新的居住地后，人们更容易进入先前存在的以来源地、方言和宗亲为基础的职业圈。

四、职业特性

最初，加尔各答的华人主要从事四种职

业：木工、制鞋、制革和牙医。从 20 世纪初期到中期，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他们开始进入其他商业领域，如洗衣、餐饮和美容等。他们从事这些行业有的是因为在来印度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有关的技能，也有的是由于当地居民视为不可接触者从事的职业而不感兴趣。印度华人的职业根据来源地划分，比如大部分的木工都来自于广东省的四邑，客家人从事制革和制鞋业，湖北人则以牙医居多。

（一）广东木匠

广东木匠，特别是四邑地区的木匠，从一开始就居于行业的优势地位，在加尔各答华人社会中的人数和影响都比较大。他们是最早来到印度的移民，主要是为英国人工作的契约工。他们在行业内非常有名，很多人甚至成为高级管理人员，用华人的话讲就是在他们工作的码头和工厂他们是“第一”。谭长森（Tham Chan Sing）是 1952 年来到印度的广东四邑人，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他投靠之前来到孟买的父母。他的祖父也是最早来到印度的一批移民，当时被英国人带到孟买在马兹高（Mazgaon）码头工作。“是华人建造了所有的港口和码头，甚至加尔各答的港口也是华人建造的，”谭长森这样认为。

谭长森最初是作为一名学徒学习机械修理，华人通常称之为“机床工”。“对我们来说接受技术培训非常重要，否则，没有人愿意雇用你，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没有一技之长。”学徒工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是必须坚持下去。谭长森在离家很远的一家工厂工作，他每天很早就要起床以便能够按时到达工厂。他每天工作 8 小时可以赚到 8 安那（半个卢比），周末只有半天休息时间并且他要工作 5 个小时才可以赚到 4 安那（四分之一卢比）。每工作一年按每小时 1.5 安那长工资。这是一份艰苦的工作，很多年后，他转行到一家亲戚的餐馆去帮忙。然而，在那里他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出门，直到大家都熟睡后才能够赶回来。于是，他辞了这份工作又回去做机床工了。他认为：“以前人们可以换工作，但是现在困难多了，竞争压力很大，一旦你开始做一行工作，就必须坚持下去。”

吴汝桐在最初到达加尔各答时没有一点木工知识，因为这不是他的“工作领域”，但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学习木工技术。“起初是做学徒，每天挣一个卢比。在加尔各答有很多木工师傅，他们大都是我们从村里出来的，愿意教别人。在那时木工很容易找到工作，并且允许犯错误。于是，我们就掌握了这门技术。我们给英国人工作，但他们不太了解木工行业，不是很“精明”能挑出毛病，所以我们能侥幸过关。于是，我们成功了。”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鞋匠身上，他们在加尔各答的店铺工作，掌握了制鞋技能。

吴汝桐在船上当了九年的机床工，其间他环游了全球。起初，他想返回中国，但内战爆发后他决定在加尔各答定居并娶了一个华人女孩为妻。1953 年他以领班的身份到胡格利（Hogly）船厂工作。至少有 40 名华人木匠在那儿修船。事实上，华人可以做胡格利船厂的任何工作，直到 1962 年中印边界之争导致了一场短暂的战争。结果，大部分华人木工离开加尔各答，回到中国大陆或者去了香港。

“我们通常签订一些小型合同、做一些规模不大的工作。”吴汝桐以前的雇主也是一名华人，后来移民到加拿大，他答应一旦在加拿大安顿下来就把吴汝桐带过去。但是，这幕情景从来没有出现，愿望的实现需要奋斗。吴汝桐的前雇主给了他一间小工棚使用，吴汝桐通常从那儿承包一些小合同。由于在语言和沟通技巧方面存在障碍，吴汝桐很难拿到更多的工作。每天都需要战斗，他很难赚到足够的钱去给工人发工资。想起每周六都要到处奔波去筹钱发放工人的薪水，吴汝桐不禁眼含泪水。他经常从岳母那里借钱，直到自己手里有钱了才能归还。这种情形每周都会发生。而且，抚养五个孩子也是艰难的事情。

幸运终于降临到了吴汝桐的头上，他与加尔各答附近的一家黄麻加工厂签订了一份做家具的大合同。为了赚到 8000 卢比，他必须每周要准备一卡车家具。当时，几百卢比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确实是他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合同。不幸的是，这件事引起了把工棚租给他的前雇主的注意，并且引起了对方的嫉妒。现

在，他帮助过的人生意好了，前雇主想收回承诺并排挤吴汝桐。这种情况迫使吴汝桐在1965年建立了名为“吴记木厂”的属于他自己的木料加工厂。为此，吴汝桐和他的前雇主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司法诉讼，耗尽了家中的大部分积蓄和资源。最终，他获得了胜诉。现在，吴汝桐已经退休了，他的两个儿子在管理着公司。另外一个儿子在美国，一个女儿居住在加拿大。

（二）客家鞋匠和制革匠

按照印度种姓制度，制鞋被看作是地位非常低下的不可接触者才从事的工作。“很少有印度人去做鞋匠，因此加尔各答的华人发现很容易进入这个行业。我们不信仰种姓制度，进入这个行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对于华人来说，它同其他工作没有区别，”70多岁的林治如这样认为，他是加尔各答一家鞋铺的老板。根据他的看法，一些客家人在泰国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接受了制鞋培训。这些客家人可能对最早进入印度的中国人进行了制鞋培训。

与木匠和牙医不同，制鞋需要很长的工作时间并且利润也很低。但是，正如林治如指出的那样：“这对加尔各答的客家人来说仅仅是谋生的一种方式。”林治如回忆着，“尽管我的父亲有一家小鞋铺，我们销售各种鞋，但家里从来没有多少钱。这是因为我们赚的钱必须都寄回中国给家庭的其他成员。1962年以后，当我们无法再寄钱回中国时，我们才开始能攒下一点钱。我们住在唐人街的提拉蒂市场，那里住了很多华人移民。二战期间，我的母亲给驻扎在那里的很多中国士兵洗衣服。那时，她还必须帮忙制作一些鞋帮以补贴家用。这些都是在晚上做的，很多客家人家庭靠缝制鞋帮生活下来。”

本提克街（华人叫做“鞋街”）在加尔各答的华人制鞋业当中非常有名。在本提克一条街道上过去有几百家客家人开办的鞋铺，现在剩下不到70家。这些鞋店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但制鞋仍然是很有利润空间的生意，因为华人手工制作的鞋很有声望，在当地有市场需求。现在，客家人不再制鞋了，他们开始转向鞋的销售。由于其制作工艺古老及他们不愿意

（或无力）改变这种传统工艺，加尔各答的客家人已经丧失了他们在制鞋市场的份额。大部分年轻的客家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因为他们看不到发展前途。现在，本提克街道上的华人鞋铺已经显示出衰落的迹象。

在20世纪的前25年间，加尔各答的华人制鞋业中出现了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他们开始进军加尔各答郊区的塔坝地区（也被称作丁加拉 Tangra），在那里尝试是否可以晒制皮革。这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想看看他们自己是否能制造制鞋所用的皮革。

根据欧爱玲（Ellen Oxfield）的研究，1910年时第一批华人制革者来到塔坝。他们在塔坝建立商铺，那里已经有低种姓的珈玛（chamars）印度教徒从事小规模制革生产。塔坝是一片带有水塘的沼泽地。在开展大规模的工作之前必须先用竹子搭建一些平台。晒制皮革是一项非常原始的、劳动强度大的工作，通常被称作“窖制”（pit tanning），皮革被放入深窖后需要用脚踩实。没有机械，也没有现代技术。客家人不仅要在深窖里长时间地劳作，他们也很贫穷，经常缺吃少穿。杨莲是当时居住在新娘市场地区的广东人，回想起那时广东人很富有而客家人很贫穷，那些在塔坝地区的人则是最贫穷的。“人们可以一眼就认出居住在塔坝的人，”他说，“他们面黄肌瘦，就像刚刚遭受过大病一样。”

欧爱玲指出，二战期间对皮革的需求推动塔坝地区出现了新的华人制革厂。战争期间总共有70家制革厂。这个数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升了，当时有超过82家的华人制革厂和大约300家的皮革公司从事皮革交易。20世纪70年代出口机会的增加带动了制革业增长，加尔各答地区的客家人社会也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繁荣了。制革生意的繁荣吸引来了城市其他地区的华人居民，促进塔坝地区发展成为加尔各答的一个新的唐人街。

林治如这样解释他的家庭进入利润不断增

Ellen Oxfield, *Blood, Sweat and Mahjong: Family and Enterprise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长的制革行业：“在70年代前期，塔坝地区生牛皮的需求量很大，我的兄弟认为我们应该进入制革行业，因为这里面有钱可赚。”当时，林治如兄弟对制革行业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愿意学习。起初，他们雇佣了制革行业里的专家并向他们学习。兄弟俩拿出他们的积蓄在塔坝地区开办了他们的第一家制革厂。林治如说他非常开明，愿意采纳各种新方法和新技能。比如，他们的工厂在这个地区最早使用电力设备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峰之后，塔坝地区的制革业开始急剧衰落。下滑的原因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制革业缺少创新和多样性以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对皮革的需求。第二，地方政府以保护环境为由，要求制革厂迁移到新的地方。塔坝地区的皮革工厂在很长时间内只供应俄罗斯市场，且只有两种皮革能够大量销售给共产党政府。俄罗斯人只能选购政府提供给他们的产品，不存在款式或者花样选择的问题。“在塔坝，我们闭着眼睛大量生产黑色和棕色的皮革，日复一日，我们的每家工厂都在生产着同样的皮革”，林治如说。印度华人赚了很多钱，却没有进行创新或者改进皮革的质量。林治如解释说：“那时不需要考虑市场竞争，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但是伴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崩溃，我们完全失去了那块市场，现在我们必须到自由市场去竞争。在皮革市场上，别的生产商已经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甚至我们使用的机器也落伍了。因此，塔坝地区的人开始感觉到了压力，有些人选择了离开这个行业。”

皮革制作商也没有用他们早先赚到的利润进行多元化经营。除了制革业他们没有经营其他行业。利润被再次投资到制革业，而不是转向其他投资领域。林治如说：“除了制革，塔坝的客家人不知道还有其他生意可投资。当我们忙着从皮革业赚取利润时，确实不需要考虑投资其他领域。我们家就是一个例子。几年前我们开始经营家禽生意，我们在这个行业正在蹒跚学步。另外一家进入化学行业，现在做得很好。”林治如觉得大部分人都不要去其他生意，因为他们不想冒任何风险。

城市当局和印度高级法院因环境问题最近下令关闭和迁走塔坝地区的制革厂，这给了当地华人社会最后的致命一击。这不仅意味着要关闭华人开办的所有制革厂，依赖制革厂生存的辅助产业也将倒闭。另外，华人的工厂和生活一体化的独特居住模式也不复存在。最重要的是，这将导致印度仅有的唐人街消失。

（三）湖北安牙工

湖北人以“安牙工”而著称，他们是一群料理口腔卫生的人。这些安牙工通常在村庄间巡走，走遍乡下各个角落去帮人修补和清理牙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似乎是在中国社会动荡期间从海上逃难出来的。毛齐伟（Mao Chi Wei）是一个比较健谈的华裔第二代牙医，他的父亲很早就迁移到加尔各答了。与他的父亲把牙科当作一门手艺和谋生技能不同，毛齐伟是一位专业的牙医，拥有牙科学位。他认为大部分安牙工都是四处游走的人，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每到一个小村庄，安牙工都会雇用当地一个当地人帮他四处吆喝“牙医”到来的消息。通常他们会在一个村庄工作几天，然后再前往下一个村庄。平时，家庭成员都是跟随着安牙工走动，孩子们从他们父辈那里学习这项技能。

湖北安牙工到达印度以后，他们仍然延续着四处游走的习惯。那是因为湖北牙医及其亲属大都居住在印度非常偏僻的地方。毛齐伟的家庭就是这种四处游走的湖北牙医的一个例子。毛齐伟的母亲随她的父母来到加尔各答时只有两岁（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的父亲是一名安牙工，父母通常要走遍整个印度，包括德里和孟买，给人修牙。

安牙工的家庭成员通常也要做一些工作以补贴家用。比如，当男人在外面安牙的时候，妇女和孩子就做一些纸花和装饰品。实际上，制作纸花是大部分湖北人家庭一种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加尔各答的很多家庭都只依靠这种技能维持生活。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果之一是政府制定法令限制华人四处走动，湖北人也因此在加尔各答定居下来，逐渐成为这个城市的永久居民。这不仅迫使安牙工提高他们的技能，也让他们的生意开始兴隆，使他们的家庭

成员避免经常流动而过上了更加舒适的生活。

湖北安牙工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他们很少同这个圈子之外的人结婚。毛齐伟的母亲出生、成长都在加尔各答的伞巷并且嫁给了同样居住在这里的湖北人。湖北人群体坚持互相帮助、支持。他们很重视参加湖北人举办的各种庆祝仪式和集会。现在，加尔各答居住着不到 50 户湖北人家庭。

(四) 加尔各答华人的其他职业

加尔各答华人在其他行业也比较有名，如洗衣、餐饮和美容等。来自上海的移民在这个城市经营洗衣店。尽管这些洗衣店的数量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有很多洗衣店遍布加尔各答的各主要街道，吸引了众多的本地顾客。同样出名并且是印度华人重要收入来源的是餐饮行业。至少是从 20 世纪早期以来，华人餐馆和小吃连锁店就存在于加尔各答了。事实上，在整个 20 世纪，加尔各答的主要商业区至少有 5 家有名的华人餐馆。唐人街上的南京饭店据说是英国官员经常光顾的地方。独具特色的中国餐饮烹饪手法已经成为印度家庭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华人餐饮业的流行吸引了很多年轻的印度华人以及那些放弃制革生意的人。他们练习烹饪并到加尔各答以及全印度，近年来甚至到世界各地的中餐馆去工作。近年来这种情况遍及到了整个印度乃至世界其它各地。学习烹饪不需要很高的教育水平，只要花些时间就可以掌握这门技能，是非常适合辍学的印度华人年轻男性掌握的谋生技巧。

加尔各答和印度其他城市的华人从事的另外一门重要行业是美容沙龙。林赛 (Lindsay) 大街上的伊夫美容院是 50 年前加尔各答最早开设的美容沙龙。凭借着灵巧的双手，加尔各

答的华人女孩子们成为这一行业的佼佼者。与制鞋和制革相似，传统的印度社会非常瞧不起理发和美发这一行业。华人利用这一空隙占据了优势。她们从理发开始，不久就独自成立了具备充分资质的“美容院”。起初，华人社会中的一些保守力量反对年轻女性进入这个行业。例如，杨莲 (Young Lien) 说她的叔叔坚信“良家出身的女孩不能进入理发业，否则就是堕落”，反对她去学习理发。但是，杨莲还是被这门行业吸引了，因为她的很多朋友都因在美容院工作赚了大钱。

随着现代印度人越来越意识到外在形象的重要性和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多，华人女性也从美容行业中找到了更多赚钱的机会。因为在美容院工作不需要很高的教育，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非常适合华人女性。同华人的餐饮业一样，美容院也成了现代印度华人社会的同义词。在加尔各答和印度其他地方的华人社会里，人们通常会发现，华人家庭中的男性一般在经营餐馆，而他的妻子则在美容院工作——如果她没有自己经营美容院的话。

因此，我们看到加尔各答华人所从事的大部分行业都与要求教育水平不高的传统行业有关。他们主要从事手艺活，这些技能或者从父母那里传承而来或者经过一段正规的学徒生涯获得。大部分都属于家族生意或者职业。但是，正是借助这些技艺和生意的帮助，华人才能够摆脱贫穷和难民的生活。今天，大部分加尔各答（与印度其他地区一样）的华人经济宽裕，能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然而，也有很多人离开印度前往加拿大和美国去寻求更宽广的发展空间。